

在精神高原上梳洗文学翅膀

□徐 剑

青藏高原是我的福地。苍茫之中，仿佛隐没着我向往、跋涉的一座座文学神山。然而我走近它，纯属偶然。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非智者，也非仁人。喜欢西藏的神山圣水，皆因了当年一位十八军的老将军。那年，第一次跟他进藏，他69岁，我31岁。我刚从一次命运旋涡里浮出来，伤未结痂，便跟着他去了青藏高原，在格尔木周游数日后，准备第二天上山。上山前那个晚上，我一夜未眠，担心将躯壳扔在天路上，像牦牛骨架一样，成为茫茫荒原中的路标。果然，第二天在岗巴拉上，我钻出开着暖气的吉普，鸟瞰卓羊雍措宝石般的湖面，披襟岸峭，喜开阔无边，任雪风横吹。晚上到了江孜便感冒了，患上了肺炎。在班禅大师驻锡寺扎什伦布寺昏迷了三天三夜，梦回天堂，逃过生命一劫。醒来时，头上便仿若罩了天藏之光，回到汉地，人生从此否极泰来。

以后，我搞起专业创作，游牧山水的机会多起来，西藏仍是首选。20年间，竟去了11次，隔二、三年进一次藏，多则待三两个月，少则十天半月，且越去越顺，越顺越去。记忆犹新的是写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前后采访、准备了8年，采访过300多名参战的老兵，上至中将，下至普通士兵，留下十几本手记。最后一程是去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克节朗河谷，踏勘战场遗址。河对岸是印战区，林莽中满是枪口、炮口。那年，我刚至不惑，山南分区派了一位侦察参谋陪我去了错那，站在5200多米高的波拉山口，可远眺仓央嘉措的故乡达旺。随后，绕过九十九道弯，下到谷底，便是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总指挥张国华将军的指挥所。再前行，道路被山洪冲断了，送我的车到断路一头过夜等我，我则跃过泥石流地带，坐上边防营一辆大屁股北京吉普，往夏尔巴人所在地驶去，直至公路尽头。翌日早晨，两位从河北廊坊入伍的老兵陪我们上山，他们也许觉得我面相嫩，岁数不大，所以爬得很慢，冷雨纷飞，小径泥泞，惟有牦牛和野山羊可攀。爬第一个台地，海拔不过2600至2800米，我的心便蹿到了嗓子眼。然而经过4个小时跋涉，最终抵达海拔4300多米的边防连队，看到了当年战场开口之处，弄清了当年打仗摆兵布阵的南北西东。

对于非虚构的文学写作，我仅遵四个字：读书行事。读一部部天下活书、活的历史——大写的的人生。与一位位采访者交谈，我乐此不疲，觉得展开的是一卷卷大书，受益匪浅。再就是行走，即古代文人墨客的壮游，非虚构写作需要这样的壮游与行走。特别是行走在青藏高原上，无野无边，天际湛蓝。置身其中，人何其渺小，生命如此脆弱，但是，对于一颗跳动的文学之心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运。那一刻，蓦地觉得胸襟大了，天下小了，生命之旗高昂了，文学的须弥山在前方隆起。

回京后，坐在文案前写那场早已远逝的战争，我觉得底气十足。8年的准备，气道如虹，皆凝结于《麦克马洪线》键盘的敲击之中，

犹如枪炮声响起。整整10个月，我几乎每天太阳升起时就坐在电脑前写作，直至凌晨方睡，我与那300名老兵，一起经历了一场战争，下了一回地狱。当53万字书稿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我终于释然了：能不能发表出版，皆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告慰躺在雪山下的英灵，可以给那300名老兵一个交待，也无愧于一位军旅作家的天地良心。

写完此书，已经是2004年春天了。我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就我个人创作而言，仿佛沿着一架天梯，爬到文学庙堂的第一座天门前。兀立而立，蓦然回首，后山晴川历历，一条栈道逶迤而来，景色宜人。而前山则烟雨迷蒙，险峰无尽，云遮雾绕，偶露峥嵘，却不知抵达巅峰还有几程？斯时，我已经创作了非虚构导文学系列的《大国长剑》《鸟瞰地球》以及长篇电视连续剧《导弹旅长》、西藏系列的《麦克马洪线》。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为期4个月的专业文学培训，倒不觉得文学课有多么精彩，但进去几天之后，便喜欢上了高研班的气场，还有那些大文化课，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科技、军事、音乐、舞蹈、美学。90岁高龄的周汝昌讲《红楼梦》，只讲了1个小时，然而他对红楼梦伏线的解释，可谓慧眼独具，点石成金；还有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讲“云计算”，展示了一个诡谲多姿的未来，国防大学教授讲三军联合作战，让作家跃升了一个高远的平台。

然而，那4个月，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中年作家的危机感，觉得写作无意义。很多人似乎都在制造文字垃圾，再过20年、30年、50年，读者书架上还会有我们的书？或许这种危机感，恰好是一个中年作家在创作突围前的一次沉思。整个2004年，我就在读书中悠然度过，继续与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卡尔维诺、伊萨克·巴别克、张岱、徐渭、纳兰性德，还有新结识的纳博科夫和赫尔曼·黑塞神交。仅写了一篇与鲁院同学游历锡林郭勒无上都的散文《城郭之忆》，便为2004年鲁院作家高研班划了一个句号。

那年9月份，我跟作协去云台山创作基地，在竹林七贤饮酒吟诗地游牧。突然接到电话，安排我第三度上高原，采访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此前我已经上去3次，追踪四载。一次次高原之行，一颗文学的心被高原的流云烟雨雪花和蓝天净化了，一片精神高原也在前方隆起。天路之上，看着三步磕一个长头的朝圣香客，凝眸坐在酥油灯里清修的喇嘛，还有那大昭寺前磕十万个长头的牧人，似乎觉得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文学本来就是寂静、寂寞的，更需要这种宗教般的虔诚与执著，它的最高创作境界应是独步孤绝，最高精神指数应是悲天悯人，敬畏天地，敬畏山川，敬畏苍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须上接天心，下接地气，何必在乎身前的喧嚣寂静，身后的浮名利禄。就在那一刻，我被灌顶了。

10月下旬回到北京，我又找回了自己，捧

着那颗依然滚烫的文学之心，于京城的秋夜，开始了《东方哈达》的创作。站在北京仰望高原，仰望神山，仰望圣城，鲁院高研班4个月学习的那层窗户纸被捅破了，我终于看到第二座天门了。非虚构文学最需要的是文本结构和叙述姿势的创新与突围。当下的报告文学似乎谁都能写，但真正写得好的凤毛麟角。这些年人们陷入了一个误区，似乎只要抓到一个好题材，就成功了。殊不知报告文学的神、魂是人，人的情感和心灵，再就是独特生动的细节。一线的报告文学作家注意到了这个文学之魂，可是对本文结构、叙述语言与姿势却缺少自觉，也落下不少诟病。我觉得应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给《东方哈达》谋篇布局时，我想起那天坐着列车穿越柴达木盆地时，格尔木城将近，一列火车对面驶来，擦肩而过。一个激灵过后，我想，何不采取上行列车和下行列车的结构，上行讲述从北京零公里至拉萨的修路故事，下行则以列车进站时一个个岔道，叙述青藏铁路沿线汉藏两大民族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一条青藏铁路以哈达隐喻，它挂在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上，是祖国人民献给西藏的，也是藏族人民致敬给中华大家庭的。经过10个月的写作，《东方哈达》出版了，好评如潮，也使我的创作实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此去经年，青藏铁路的写作记忆已被雪风吹散了，但是我对文本结构的追求与突围，依旧痴心不改。汶川地震的写作，我对文本结构的意识与追求更趋自觉。反映2008年抗冰雪灾害的《冰冷血热》，我采取与受阻于冰雪道上的女儿短信来勾联那场冰雪奇寒，远行列车，楚山勇士，一纵一横相得益彰。写创新型企业与国家的《国家负荷》，我采用中国古老符咒、金木水火土、天干地支和阴阳图腾符号的构思。随后，在反映中国战略导弹部队20年新军事变革的导弹系列第三部里，我采取从一头一尾的结构，开头从1991年写起，而尾声则从2011年写起，最终交织于2000年，搭成一个门塔结构。写完这两部书后，我又去了青藏高原，写横跨青藏铁路之上的电力天路——正负400千伏青藏联网工程，书名《雪域飞虹》。这是我第11次入藏，待了40天，顺便为《封疆大吏》采访。在西藏的日子，我喜欢在寺庙前闲逛，与磕长头的香客交流。他们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那眼神，那笑靥，不染一点俗世的风尘，让我着迷。看着他们坐在林卡、墙角下，晒着太阳，慵懒地发呆，沉思冥想，我发现，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之道。

那天走近神山，喜马拉雅掀开神秘盖头，7座雪峰的伟岸之姿一览无余。在珠峰大本营待了3个多小时，我竟无任何高原反应，任雪风梳洗文学的翅膀，让精神高原跃升我的文学海拔。后来，我去了梦中神游多次，在西藏朝圣教地最高的拉姆纳措，双手合十，虔敬朝湖，我看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也看到自己创作的今生来世。转山转水，离开时，魂儿便扔在了那里。

■印 象

我的兄弟叫徐剑

□萧立军

我阅读徐剑的报告文学《大国长剑》和《导弹旅长》的时候，还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军人。但我从他的作品中已经看出徐剑是一位长于处理正面题材的作家。当时，我负责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初评组织工作。评论家李炳银较推崇《大国长剑》，我也很赞同。因为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几乎是正面题材的天下，大量作品都是人物和行业表扬稿，已经形成了僵硬的创作模式，作品的深度不够，读者不待见，导致一部作品只有编辑和作者必看，被描述对象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熟人们看。报告文学作品的这种尴尬相，已然报告文学界着力要解决的大问题。

而作为军人作家的徐剑，据我所知20多年来已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正面题材。以他一个军人的身份，不好去接触、反映负面题材，于是无形中给他的创作形成了压力，很难突破自己。

作家最忌讳自己重复自己，而面对一个一个个的正面题材，又怎么来突破自己呢？

我已不记得第一次和徐剑是怎么见面的，约略记得是在一个饭局上。我见他每端起酒杯就一脸苦相，喝一杯酒后还是一副苦瓜相。我这张爱说人的臭嘴，就想劝告他喝酒是享受，别做痛苦状。但是由于不熟悉，我就使劲忍住了。慢慢地，与徐剑来往多了也就熟悉起来，我就忍不住地说：徐剑啊，喝酒是个愉快的事，你老弄出一副“苦瓜相”，反倒把喝酒搞成了受罪的事儿了，你还喝它干啥？于是，往后他再端酒杯时，就做出“甜瓜相”，一口干了后，勉强把嘴角拉成10点10分状，看上去自然还是一副受罪相。我就知道徐剑虽然有酒量，但是对酒没多大兴趣，他只是和朋友凑热闹时，不让大家扫兴罢了。

徐剑的有趣不仅在于他的随和，还在于他的拗。有一次“十一”放假，一群朋友去山西玩，到了大寨吃晚饭时商议第二天的行程，徐剑极力主张去平遥看古城，而另有人主张去黄崖洞。两个地方都是好地方，问题是“十一”长假到平遥这种人为为患的地方只能参观别人的后脑勺，而在黄崖洞就可以坦然欣赏自然风光。无论大家怎么掰开饽饽说出馅，徐剑还是坚持要去平遥看古城，其拗于此可见。因为要去黄崖洞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这才把徐剑裹挟了去。及至，徐剑被黄崖洞的好风光吸引了，拎着他的大炮相机，蹲着趴着躺着一通狂拍，终于承认选择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从此，大家就把徐剑定为“错误路线头子”了。

其实，徐剑的随和徐剑的拗，在他身上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这在他的创作上表现得更明显。如他写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不仅用仓央嘉措情诗来为每节做引子，更是将铁路的上行下行及道岔作为作品的结构来叙述。我认为以这题材本身体现的形象作为作品的结构形式，是最为贴切的。不仅生动地表现了青藏铁路建设者的情怀，而且更深刻地凸显了青藏高原博大的人文精神。但有朋友认为他这样太注重形式不太好。徐剑听后就拉着朋友，脸红脖子粗地阐述他的创作意图，直到把朋友说得频频点头才作罢。再比如，他写了关于二炮的长篇报告文学《逐鹿天疆》后，给老编黄宾堂看，之后徐剑给我打电话说老黄没看好，要发个电子版给我再看看。至于老黄没看好什么，他没告诉我。待我看了他的《逐鹿天疆》时，我也觉得他写得不太好。后来我们见了面，我就说：你的这部长篇写得太求全了，凡你采访的人都不想落下，老觉得对不起人家似的。这哪能行啊！这内容一重复，就会有冗长而沉闷的感觉。这是你最熟悉的题材，你却忘记了节制，远没有你的长篇《国家负荷》写得生动水灵。《国家负荷》的视野和思想能力是你创作的延伸，标志着你在突破自己。徐剑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说：看来是我出了毛病了，我得推倒重来。

这就是我的兄弟徐剑。

民族传奇的审美呈现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徐剑于1994年开始专业创作，1995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1998年该作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那年，徐剑刚好40岁，有些大器晚成的意味。这之后，徐剑一发而不可收，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除鲁迅文学奖外，他的报告文学作品还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图书奖等，其本人也被中国文联授予“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家称号。现在的徐剑，已然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跨世纪重量级报告文学作家。

《大国长剑》是徐剑的成名之作，其所聚焦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即第二炮兵部队）是他创作题材的重要关键词之一，而纵观徐剑近20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其题材选择基本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这就是二炮、西藏和国家电网。可以说，其代表作无一不与这三个关键词紧密相连。《大国长剑》《鸟瞰地球》《遍地英雄》的“主角”是二炮部队，《东方哈达》《雪域飞虹》《麦克马洪线》主要写西藏，《国家负荷》《冰冷血热》聚焦国家电网。这三个关键词，基本可以概括徐剑报告文学的书写视野，即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为核心的军事文学创作，以国家大型工程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文学”创作。即使是其中穿插的譬如对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的描述，也离不开这三个关键词，如《遍地英雄》以汶川地震为题材，但主要是记录二炮的抗震救灾，《冰冷血热》以南方雪灾为题材，但主要是写国家电网职工的抗冰保电。

在这三个关键词里，对于二炮部队和西藏的书写，与徐剑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年轻时从军在二炮部队，时至今日仍然坚守在这一岗位上。他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藏，此后六上青藏高原。因此，无论感情、阅历，还是职业，二炮和西藏都已成为徐剑最为重要的灵感资源，他在长篇散文《灵山》里所表达

出来的对于西藏的浓烈与痴迷情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雪莉·艾利斯在《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一书中指出，非虚构文学创作中往往会存在两种声音，即“天真之声”和“经验之声”。“天真之声”叙述的是个人经验的事实。徐剑对于二炮和西藏题材的钟情，也大抵有着“天真之声”的内质。而有关国家电网的纪实性文字，又使徐剑凸显记者型报告文学作家的特质。在报告文学写作的传统中，一直都存在着作家型和记者型写作的两种风格。在记者型和作家型写作主体那里，报告文学文体多呈现出两种样态，即“文学性报告”和“报告性文学”。一般来讲，前者会突出显现以非虚构性中的新闻性为基础、并融合文化批判性的文本内蕴，而后者则注重给予报告文学文体以语言体式 and 叙述模式上的新启迪，并使之更具审美的意味。徐剑作品比较明显地倾向于后者，但也不乏前者的质素。

这三类题材中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或许带有比较多的“命题作文”色彩，对此，徐剑有自己的想法：“穿着这身国防绿的军旅作家，命题作文太多，还不能不写，纵使是表扬稿，还要写出人性人情来，纵是戴着镣铐跳舞，还要跳出优美的舞姿来……”由此可见其清醒的创作意识，即力求艺术地呈现“命题作文”所规约的宏大主题。这种意识从《大国长剑》初露端倪，到《东方哈达》登临高峰。

二

如何艺术地呈现宏大主题，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至为关键。徐剑报告文学所涉及的主题可谓不宏大——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成长历史、青藏铁路的建设历程、国家电网的科技创新之路、抗击南方特大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救灾纪实。这些主题看似互不相连，但其所汇聚的意义却存在一致性，它们从现代化军队建设、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等多个维度见证中华民族的

重新崛起，诠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实质，给人以信心、力量和智慧的启迪。“最好的非虚构小说显示出一些辨别是非的审美能力，这种能力在所有的时代对持续不断的人类困境来说，都起到一种向导作用。如同任何时期最好的文学，这些作品最终都具有人的性质和人类解决面临的困难的力量。”约翰·霍洛韦尔的这番话，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非虚构小说，我以为它也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徐剑报告文学的主题在今天所蕴含的深意。

然而，主题的宏大并不能与作品的成就画上直接的等号。对一种非虚构的文体而言，艺术的呈现或者说审美的呈现，有时甚至会显得比小说更为必要。“文学并不是因为它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成为形式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马尔库塞在这里强调的正是艺术的审美呈现问题。而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就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以至于一些报告文学只见“报告”不见“文学”，削弱了这一文体的审美力量。在我看来，徐剑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看重文体审美价值、注重文体审美传达的代表之一。这种“看重”与“注重”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宏大主题与题材的史诗性把握和呈现。《大国长剑》《鸟瞰地球》中对于中国高科技军事力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描绘，就典型地浸润着古老东方民族大国崛起的史诗性表达。他并不是要再现一个穷兵黩武、称霸世界的国家形象，相反，他是通过书写特定的军人群体，表达“铸剑为犁”的和平祈愿，以及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东方哈达》没有流程般刻板地报告青藏铁路作为国字第一号重点工程建设的始与末，它几乎颠覆了报告文学书写重大工程拘泥于事件本身“见事不见人”

以及表扬稿式思维的常规套路，而是借题发挥，或者说以工程建设为引子，以艺术的穿透力和营构力，将青藏高原的历史与现实、宗教与民俗、文化与风情等融为一体，自始至终充满着梦境般的诗情与画意。它在纵横捭阖之中，由艺术呈现生发至文化呈现，最后抵达思考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哲理思考，为人们勾勒出自然青藏、人文青藏和哲理青藏的多层次内涵。《国家负荷》则表现出别样的韵味，那就是艺术地传达科技精神、生动地活画出人的精气神。作者写的是国家电网的科技创新个案，其深意却在于充分揭示其作为创新型国家高地和中国人自主创新品牌品牌的本质，形象化地传达出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

看重文体审美价值、注重文体审美传达，对于徐剑来说，并不仅仅是对宏大主题与题材的史诗性把握和呈现，它还表现在对文本结构和语言等要素的精心构筑上。

徐剑的报告文学大部分为长篇。以几十万字的篇幅构建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无疑是对一个作家艺术智慧的极大考验。徐剑以积极的探索精神迎难而上，力求在结构上使每一部作品都能展示出新意。《大国长剑》的成长史式结构、《东方哈达》的上下行列车式结构、《国家负荷》的阴阳五行和金木水火土式结构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东方哈达》的信息量巨大，但最让人过目不忘的正是它融会历史与现实、文明与乡土的“上行与下行列车”的独特结构方式。这十分契合其书写对象——“铁路”建设，同时又层次分明。上行列车表现“现实”，写法倾向于铁路建设的“实”，下行列车追忆“历史”，写法倾向于历史、传说与文化的“虚”。上下行交叉，既生动地表现现实与历史的交错与纠结，又使全文灵动，祛除了

□王 晖

